

以陶为师

血在沸

■何文秋

在南京晓庄学院师德教育馆的仁爱之心展厅,有一幅珍贵的黑白演出剧照。照片拍摄于1929年,纵8厘米,横11厘米,是晓庄剧社演出《生之意志》的剧照。照片中,陶行知先生扮演老父亲,身穿长袍,外罩一件深色背心马甲,头裹一块淡色方巾,坐在一竹椅上。另一个演员是学生谢伟策,扮演儿子,身穿深色西服,站立着,正用双手接过老父亲递来的东西。

1929年1月,著名戏剧家田汉带领南国剧社到南京演出。陶行知认为,革命的戏剧是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遂派农民、教师和学生代表进城请南国剧社到晓庄演出。田汉欣然应允,在晓庄师范礼堂前搭建的简易舞台上,先后演出《卖茶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哀》等剧。陶行知借机成立晓庄剧社,兼任社长,创作了《生之意志》《爱的生命》《死要赌》等独幕剧,并亲自出演。这张黑白剧照,正是当时晓庄剧社的光影留存。

照片中的青年学生谢伟策是湖南长沙人,1910年出生,自幼家境贫寒,酷爱读书,喜欢看戏唱戏。1927年初,陶行知在南京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报刊上登出招生广告。谢伟策看到后热血沸腾,立志当一名乡村教师,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来改造社会,谋农民之解放。尽管当时战事频繁,路途艰难,但扑不灭谢伟策一颗燃烧的心。他辗转赶到南京晓庄参加考试,并成为晓庄师范第一届13个学生之一。

当时,晓庄师范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学校经费窘迫,师生生活困难,但始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谢伟策性格开朗,又有艺术才能,经常想些点子活跃气氛,使校园生活充满生机活力。

第一个寒假到来前,谢伟策跟同学们商量,举行一次“化妆同乐大会”。师生都可以想方设法找衣帽,涂油彩,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物,如果谁也认不出来,就是优胜者。

会场设在梨园。下午,师生一个个化装后来到大礼堂。见面后,果然都认不出来了,大家忍住笑,互相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等等。问到一些古怪问题时,个个捧腹大笑。

农事指导员邵先生装扮成一个老农,惟妙惟肖;程北海同学化装成一个姑娘,更是令人意想不到。大家正在热闹着,忽然,一个身穿破衣服,头戴破草帽,手拿打狗棍的“乞丐”出现在梨园门前,瑟缩着正要跨进门。有人立即上前阻拦,“乞丐”连连叩头悲哀地说:“先生小姐,行行好吧,我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了。”

有人不耐烦地说:“到别处去要吧,我们正在开会!”“乞丐”迟疑着不肯走。一个女同学同情地说:“怪可怜的。”女同学正准备掏钱给他,“乞丐”忽然笑了,大家一看,他竟是谢伟策。所有人一致认为谢伟策是这次“化妆同乐大会”的最终优胜者。

1928年春,陶先生派谢伟策和韩度两名同学一起创办吉祥庵中心小学。谢伟策到附近农家一户户拜访,动员农民把孩子送来上学。开学那天,刚巧刮风下雨,但热情的乡亲们冒雨把孩子送来了。谢伟策很感动,对家长们说:“谢谢你们的支持!”农民说:“你们为穷孩子办学,该谢的是你们呀!”学校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学生、家长和农友齐聚一堂,大家都非常高兴。

陶行知也冒着风雨前来祝贺,他动

情地大声朗诵道:“风来了!雨来了!谢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风来了!雨来了!韩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陶行知朗诵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谢伟策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1929年南国剧社到南京演出时,谢伟策接连几个晚上步行往返二三十里到城里看演出。陶行知请南国剧社来晓庄演戏,谢伟策更加高兴,他自告奋勇带着几个同学到路上去迎接。

南国剧社在晓庄演出,有一幕剧临时缺一个角色。田汉想起了谢伟策,便叫他来试试。演出结束后,田汉拍拍谢伟策的肩膀说:“以后到南国社来,我欢迎!”

这次演出引起了晓庄师生对戏剧艺术的极大兴趣。谢伟策成了晓庄剧社的骨干分子,并在《生之意志》一剧中,与陶行知同台演出。演出非常成功,还留下了珍贵的剧照。

1930年初,“中国人民自由大同盟南京分部”在晓庄成立,谢伟策参加自由同盟。紧接着,南京下关和记工人罢工,谢伟策参加“四·五”反帝爱国示威游行,紧随石俊、叶刚等同志走在队伍前列,高呼口号,发表演讲,表现英勇。

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封闭后,谢伟策与一部分晓庄师生转移到上海。他改名宗晖,参加南国剧社的活动。当时,田汉将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成《卡门》一剧,以影射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剧社请谢伟策饰演剧中革命者卢卡斯一角。经过紧张排练,该剧在上海大戏院公演,一时轰动上海。谢伟策扮演的卢卡斯尤为精彩,博得观众称赞。可没有几天,《卡门》一剧就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南国社也被查封。

因被叛徒出卖,谢伟策不幸被捕,很快被押送到南京,关进卫戍司令部的监狱。1930年10月8日清晨,牢房的小窗口突然打开,狱警递进来一张纸、一支笔,喊道:“谢伟策,有什么话就留下吧!”

牢房里顿时气氛紧张,难友们都站起来。谢伟策非常镇定,对大家说:“既然进来了,我本来就不打算再出去。”顿了一下,他又说:“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但愿我一腔沸腾的热血能唤醒国人,我也就死而无憾!”

最后的时刻到了。谢伟策理了理发,整了整衣领,跟难友们握手告别。监狱长问:“你的留言呢?”谢伟策拿起纸笔突然朝敌人的脸上狠狠掷去,他大声说:“听着,老子的留言就是要打倒蒋介石,实现苏维埃!中国共产党万岁!”

赴刑场的路上,谢伟策不断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直到他倒在雨花台下……1930年10月9日,南京《民生报》载:“首都卫戍司令部昨日签提共犯……谢伟策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噩耗传到上海,青年作家柔石悲愤填膺,写下一首悼诗《血在沸——纪念一个南京被杀的小同志》。

年仅20岁的谢伟策牺牲后,陶行知痛心不已。此后,他一直将和谢伟策同台表演的剧照珍藏在身边,以示对这位晓庄英烈烈烈向上、英勇无畏精神的永远纪念。

1985年,经江苏省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院组成的专家组鉴定,此演出剧照为馆藏二级文物。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直属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风物 杂谈

童年时的盛夏酷暑似乎总始于卖冰棒的人那悠长的叫卖声和自行车清脆的铃铛声。“冰棒、冰棒,卖冰棒!”卖冰棒的人推着一辆“二八大杠”,叫卖声由远而近。自行车的后座架上,绑着一个长方形白色木箱,正面用红漆写了两个大字——“冰棒”。木箱其实就是一个移动式“冰柜”,里面塞着一块厚厚的棉被,棉被里包裹的就是我们夏日里心心念念的冰棒。村里的孩子们循声而去,眼巴巴地聚集在他的周围。

遇到有大人带着孩子来买冰棒,卖冰棒的人迅速掀开木箱的盖子,探进手去,利索地翻开覆着的棉被,拿出一根冒着白气的冰棒,接着立刻掖好被子,盖上盖子,把冰棒递给孩子。拿到冰棒的孩子一脸幸福地吃着,嘴馋的孩子赶紧跑回家找大人要钱,其他人继续围着卖冰棒的小贩,生怕他走掉。

当时农村大多数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买一次冰棒也算是奢侈的事。虽然一根冰棒才几分钱,但买冰棒的钱绝非轻易得来,有的是撒娇要来的,有的是干家务挣来的,有的是家里过年宰杀的鸡毛鸭毛、用完了的牙膏壳等,卖给小贩换来的。一张张纸币、一枚枚硬币,由一双双高举着的手递到卖冰棒的人眼前。接下来,就是属于孩子们的幸福时刻了。

冰棒一般有赤豆、奶油两种口味。奶油冰棒是淡淡的米白色,赤豆冰棒顶端是一层小红豆,颗粒饱满,下面是红褐色的豆汤冰块,这种冰棒是我的最爱。那时候的冰棒是名副其实的“棒冰”,就是一根小木头棍儿与一块长方体的糖水冰块组合而成。我曾非常好奇,天气那么热,冰棒在厚厚的棉被里会不会化掉变成水?奇怪的是卖冰棒的人每次拿出来的冰棒都硬得能咯掉牙。孩子们站在高高的“二八大杠”前,总也望不见箱子里究竟装了多少根冰棒。

卖冰棒的人吆喝着经过我家门口时,慈爱的爷爷常常会给我点零钱让我自己去买。冰棒一到手,我小心翼翼地揭开包装纸,舍不得大口大口地咬,只一点点吃着,那冰凉、甜丝丝的感觉立时传遍全身。一切的暑气仿佛在那一瞬间都被冰镇住了。待到小棍子上面仅存的冰碴融化滴落的一刹那,我用嘴猛然接住,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浪费。有时,碰到关系非常好的小伙伴,对方那渴望的眼神常叫我抹不开面子,我把冰棒的底部对着他,叮嘱道:“小点口啊!小点口啊!”能分得我一口冰棍吃的小伙伴,那关系绝对不一般。

时至今日,我依然会在盛夏之时想起儿时冰棒的味道,难忘“二八大杠”后面厚重的木头箱子和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

难忘童年冰棒味

■王建国

心灵 火花

幸福的睡眠

■马俊

读李白的诗:“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回味诗中意趣,我忍俊不禁。我的关注点倒不在诗人和朋友之间的心有灵犀上面,而是诗人想睡就睡的洒脱不羁。诗人醉眠花草之间,如同一只卧在暖阳下酣睡的鹿,每一个毛孔都透着自在和享受,想想都觉得幸福。

世间万事,没有哪一件能像睡眠这样,能带给人即时的满足感和持久的幸福感。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学习之后,美美地睡一大觉,醒来后身心的舒畅和满足,简直无与伦比。

孟浩然有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一夜睡梦沉酣,早晨醒来便觉春色美好,万物可爱。《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写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看来,心满意足地睡上一觉,不仅能身心舒畅,还能彻悟人生。最经典的是《红楼梦》,我极喜欢“湘云醉眠”这段情节。湘云香梦沉沉,芍药花落了满身,蜂飞蝶舞,花瓣馨香。醉眠芍药从这样洒脱随意的桥段,非美丽娇憨的湘云莫属,也不知道她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美梦。当初读至此处,我不由心生慨叹:“想睡就睡,实在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

在睡眠中,人可以神驰万里,也可以修复自我。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进入睡眠状态后,人的身体最平静,呼吸最平稳。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得到充分休息,每一个器官都恢复到最佳状态。你享受过小睡片刻的快乐吗?只需十几分钟,醒来后觉得神清气爽,疲惫一扫而光。所谓“满血复活”,有时就是如此简单。

睡眠不仅能疗愈身体,也能疗愈心灵。我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件很小的事,如果在心中纠缠不休,就会变得乱如麻团。深夜无眠的时候,我们的心无比敏感,会把糟糕情绪放大。这时实在应该放下一切,好好睡一觉。睡眠的过程中,那些张牙舞爪的敏感神经,慢慢收拢了肆意蔓延的触角,重回属于它们的巢穴。睡一觉再醒来后,你会发现大事变小,小事化了一没,错,睡眠的确有这样的功能。睡一觉之后,沸腾的思绪冷却下来,我们可以清醒理智地思考问题了,往往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些被我们无限放大的事,其实不过是轻如鸿毛的小事。

生活酸甜苦辣,人生五味杂陈,每个人都有不堪其扰的时候。这样的时刻,不妨睡一觉。睡一觉就好了,天亮了就是新生。当你睡醒后看到黎明饱满的光线时,不妨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崭新的一天。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身心舒畅,满足幸福。人生在世,如果能够享受睡个好觉的幸福,明天就有的是光亮和希望。



仲夏荷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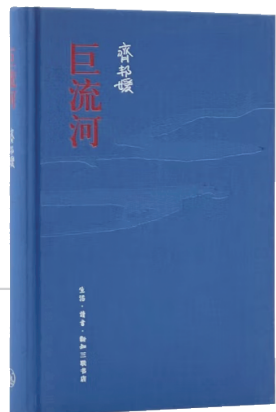
宁琳净 摄

好书 共赏

南开中学的“沙坪坝岁月”

——读《巨流河》有感

■戴荣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随着百岁老人齐邦媛的离世,她80岁时写成的《巨流河》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部书既是一部传奇的个人史,也是一份救亡图存的家国记忆。其中关于抗战时南开中学在重庆沙坪坝办学的一段内容,仍能给当今的教育工作者许多启迪,因而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

有什么样的校长
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校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便以天津日租

界为基地,向华北伸展侵略的魔掌。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深知局势危急,早在1936年就四川觅地建立南开中分校。卢沟桥事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在沙坪坝的8年,张伯苓住在校园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巡视,看到路旁读书的学生就过来拍一拍肩,摸一摸头,问衣服够不够,吃得饱不饱。

据齐邦媛回忆,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8年里,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学子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传承。张伯苓创立世全堂“中国不亡,有我!”的爱国精神,他就是“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同学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他高大的身影挺阔阔地行走在校园。不论前线战况如何胶着,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伯苓的带领下,全校师生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有什么样的教师
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

南开中学吸引了许多由北平、天津来到重庆的优秀师资,他们响应张伯苓号召,住进沙坪坝校园的津南村。直到抗战胜利,8年间很少有人离开。

齐邦媛说,津南村住着许多南开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如“数十年令我追忆难忘的国文科孟志荪老师,最让学

生害怕的冷艳数学老师张亚丽,还有教务主任俞传铨的两位女儿,从美国留学回来也在南开任教,‘大喻’教英文,‘小喻’教理科”。

当时初一到高三国文教科书主编者就是孟志荪老师。初中选文由浅入深,白话文言并重。高中语文课本则是中国文学史的文学精选,详细讲述各时期的文学发展。孟志荪教高二那一年,开创了中学课程中少见的选修课,有高二全校的诗选,高三的词选。齐邦媛说,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佳作她那两年都背了下来。

地理科的吴振芝老师教初中的中国史,提到台湾时叫学生记得“鸡蛋糕”(基隆、淡水、高雄)。她教世界地理,常带一本本又大又厚的“洋书”,给学生们看世界各地图片,开阔学生们的眼界。

一位国文学得很好的同学毕业考物理交了白卷,在卷子写了一首词言志,自思是毕不了业了。魏荣爵老师在评卷时也写了四句:“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这位同学后来考上西南联大法律系,毕业后又到北京大学教书。

有什么样的课程
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

据齐邦媛回忆,南开向来注重国

际性,英文教材难度很大,数理化科目要求甚严,连体育也是全国闻名。每天下午3点半,教室全部锁上,每个人必须到操场参加一种球队,除了下大雨,每个人都要天天练球、比赛。齐邦媛在饱受嘲笑之后,也由“靠边站”的后备垒球球员升为球队一垒手,初三那年还成为女中田径队的短跑、跳高、跳远选手。有位老师称齐邦媛跳高、跳远像没事似的,“飘”一下就过去了。齐邦媛说:“至今60多年,我仍记得跳远跃入沙坑前短发间呼啸的风,一个骨瘦如柴的15岁女孩,首次觉得人生活着真好,有了生存的自信。”难怪张伯苓说过:“不懂体育的人,不应该当校长。”

南开中学除了读书风气盛,才艺、社团活动也很多,校内常有各种合唱团、辩论赛。一次有齐邦媛参加的高二辩论赛主题本来是“男女生的读书趋向”。张伯苓看到贴出的海报说:“都什么时候了,天天跑警报,还教孩子们辩论这‘没有出息’的问题。”他立刻指导教师们把主题改为“美国会不会参战”。

所有这些都,或许就是成就南开中学的主要原因。读完《巨流河》,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南开出了那么多著名的校友,取得了那么辉煌的成就。

(作者系泰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发展规划处处长)